

## 中文版前言

自從2016年拙著 *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 由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後，世界經歷了新冠疫情及其餘波。這使得重新審視諸如中國的血防運動這樣革命性的防疫運動變得尤為重要。我非常高興石岩以曉暢的譯文把我的思考帶到更多讀者面前，使大家了解中國在公共衛生方面的創新及其遺產。在這篇序言中，我首先要將本書的主要結論置於拙著出版後我與眾多評論的互動所形成的新語境中，之後，我將報告一些新發現。

評論者稱許拙著對毛澤東時代的群眾性公共衛生運動做出了更細緻的評價，這超越了以往西方學者的兩極化認知，他們要麼不加反思地大加讚揚，要麼認為這種群眾性公共衛生運動是徹頭徹尾的失敗。評論者注意到本書的一大特色，是以地方性的案例研究取代了對全國情況的勾勒。本書選取的研究地點包括：血防運動的指揮部上海、江西省的農業縣餘江（該縣是血防運動的模範點之一），以及其他非模範點的農村傳染區。評論者認為，這些地點囊括了各種各樣的案例，而新開放的地方檔案則展示了中國基層面臨非常複雜的人員、技術和組織上的障礙。拙著也質疑了此前對毛澤東時代群眾衛生運動的理解。以往研究認為，毛時代的公共衛生運動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因為中國出色的基礎科學教育以及政府所作的愛國主義動員，後者推動民眾廣泛參與他們力所能及的清潔環境、消滅疾病的工作。而本書認為，因為農村民眾不理解疾病

預防的原理，科學教育基本是無效的。另外，以預防為宗旨的群防工作確曾大規模展開，可是糟糕的質量管控以及無效的滅螺方法，使其效果大打折扣。儘管如此，中國的血防運動仍取得了成功，這要歸功於以往較少為人所知的治療方面的工作。文革期間，對於耕牛和水牛的治療以及對民眾的免費治療全面鋪開，治療的效果顯現出來。還要考慮到，被下放到農村的專業醫療工作者與赤腳醫生一起工作，起到了傳幫帶的作用，這些因素都顯著地提高了預防的效果。隨之而來的血吸蟲病傳染面的縮小使得這個病終於被控制住了。

評論者們也注意到，本書有兩個相互交織的議題：重新評估科學所扮演的角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治理策略。關於科學的角色，以往的研究多強調毛時代的革命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與科學之間是對立的，前者經常被用於批判與科學及醫學有關的概念、個人和機構。本書豐富了對毛澤東時代科學所扮演角色的認知，並闡述了業餘的群眾科學的貢獻。不僅科學知識、職業的科學工作者和醫生在血防運動中發揮的作用有待公正評價，群眾性的科學實踐及其設置的議題對於血防的成功也至為重要。

關於毛澤東時代的治理策略，評論者們注意到本書利用基層案例分析了群眾動員實際的運作情況，其中包括對理性官僚科層制實踐的探究。以往的研究認為，毛澤東對於官僚體制的批判和革命性群眾運動的壟斷地位，意味著理性的官僚科層制在毛澤東時代後期已不復存在，在改革開放之後才重新發展起來。本書發現，以科學為導向的血防運動包括我稱之為「科學鞏固」(scientific consolidation)的過程。為了推行科學化的群眾動員，作為領導者的知識青年必須掌握新的科學技能，比如數據統計、繪地圖、建立模型、實行標準化。在此一過程中，他們開始把理性官僚科層實踐導入群眾運動。當時，很多基層幹部對於將政治資本浪費在不受歡迎的公共衛生運動上並不十分熱心，以一種例行公事的態度敷衍塞責。但為了寫出以統計為導向的報告，地方幹部必須搜集翔實的數據，再加上同儕時不時到訪、參觀，這些因素使得地方幹部在沒有強制性力量和來自上級的直接監督下，更加積極地投身血防運動。因

此，諸如血防運動這樣的大型公共衛生運動扮演了以科學方式鞏固權力的作用，在權力下放時期增強了政府將自己意志貫徹到基層的能力。

2018年，我在陝北、安徽、廣東各選了一個農業縣進行了補充性的口述訪談，目的是擴寬並驗證我此前基於血防模範點的研究。我在極端貧困的陝北做的訪談及查閱的檔案提供了豐富的信息。這一地區是如此貧窮，以至於當地直到1970年代才建立起防疫站和婦幼保健所這樣的基本醫療派出機構，真正的衛生工作直到改革開放後才開展起來。在1978年之前，以搞環境衛生為主要內容的愛國衛生運動一直由教育部門負責，1978年之後，衛生部門才接手。當地的赤腳醫生制度始於1970年代，赤腳醫生們僅僅接受了為期兩週的培訓，培訓的全部內容幾乎只是注射疫苗。陝北可以代表很多貧困地區的情況，在那些地區，醫療衛生工作在後毛澤東時代才真正得以鋪開。

我的上述訪談也證實了血防運動的主要措施之一——教育所面臨的挑戰。根據寫作本書時獲得的檔案，我間接得出這樣的結論：儘管接受了血防教育，但民眾既不懂病原體，也不懂預防工作的基本原理。在三個縣做的訪談中，農村的老人、幹部、赤腳醫生和中醫都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在改革開放之前，具體地說是在1980年代或1990年代之前，農村民眾是不懂預防工作的原理的。他們認為，下列四重因素讓情況發生了變化：生活條件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關於個人衛生的新的文化認知及將個人衛生與社會地位掛鉤的意識、慢性病發病率的增高。伴隨慢性病的流行，通過改變生活方式預防疾病的觀點變得合情合理，更易為人接受。這讓預防的觀點深入人心。

可以補充的是，健康預防工作在哪裡都步履蹣跚，在陝北那樣的貧窮地區就更艱難，因其合法性 (legitimacy) 更低。檔案史料和口述訪談都證實，當地僅有的預防工作就是讓婦女打掃衛生，男人則將精力用於生產這樣更核心的工作。這一發現驗證了部分評論者的建議：對於兩性在血防工作中所扮演角色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將提供更有價值的信息。

本書強有力地論證了下放的專業醫生在訓練赤腳醫生並為其提供專業支持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我在更富裕的安徽、廣東的兩個縣所做的

個案研究驗證了這一發現。但沒有多少專業醫生下放到陝北那個貧困縣，他們對當地幾乎沒產生什麼影響。從陝北的材料以及新近從其他一些貧困農村的赤腳醫生處獲得的口述材料顯示，經驗豐富的中醫扮演了類似於下放醫生的關鍵角色。那些醫術高明的鄉村中醫往往有相當高的文化水平，受過深厚的古典教育，一般只有富農或地主的子弟才能接受這樣的教育。因為出身不好，這些人沒有資格當赤腳醫生。在更貧困的地區，那些本鄉本土已有的中醫起到了和專業醫生一樣的作用：他們為缺乏訓練的赤腳醫生提供了持續的訓練、專業知識和技能的支撐。

總體而言，這本書的主要發現是令人信服的，而且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在新冠疫情之後，本書的出版又有了新的意義。儘管領導者變了，抗疫的手段更加現代化，醫療技術也更為先進，但在很多方面，中國抗擊新冠的種種措施是紅紅火火的毛澤東時代抗疫模式的延續。因此，回顧過去，切實地理解為何毛澤東的創新醫療模式能夠取得成功就變得更加重要。當我們認識到其曾經面臨的障礙，我們就會對血防運動克服了難以逾越的困難這一點有更深刻的認識。在全球面臨長期存在的傳染病及新增傳染病威脅的今天，我們對於諸如血防運動的公共衛生運動何以成功應有更清晰的體認，這一點變得越來越重要。

高敏

2024年12月

## 致謝

如果沒有眾多學者、科學家、檔案管理者、血吸蟲病防治運動的參與者、朋友、家人的幫助、支持及洞見，本書不可能完成。我很幸運，由彼得·吉勒特 (Peter Gillette) 擔任我最早的專業導師，他不僅重塑了我的寫作風格，使其更寫實、更生動，也是我進入醫療史、關注醫療條件不足地區的領路人。可以說，我之所以關注公共衛生方面的歷史，與我受教於吉勒特的經歷密切相關，他所示範的、將人道主義關懷與醫療知識結合的方法，影響了我對血防運動的研究。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期間，曾小萍 (Madeleine Zelin) 和白思鼎 (Thomas P. Bernstein) 指導我撰寫畢業論文，兩位老師均將學術訓練的廣度與精神上的啟發融為一體。

我最應該感謝的人是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 和畢克偉 (Paul Pickowicz)，他們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創建了頂尖的中國現當代史研究項目。我之所以能成為一名學者，離不開周錫瑞的批判性研究和廣博知識的指引；畢克偉在寫作方面給我很多指點，並使我能更有力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兩人共同創建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囊括師生的跨代際學術團體，這一團體在我的學術生涯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尤其要感謝好友葉娃，她幫我掌握了中文這門從事學術研究必須掌握的語言，她也是第一個告訴我毛澤東時代血吸蟲病防治運動的人。在我開始這項研究的時候，她還曾與我一起工作。完成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博士學業

後，我和周錫瑞、葉娃成為同事和朋友。聖地亞哥分校的學術網絡對我的成功至關重要。現任教於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韓嵩 (Marta Hanson) 向我介紹了中醫的歷史；安德魯·斯卡爾 (Andrew Scull) 拓寬了我的研究視野，促使我注意到殖民地醫療、政治學、社會學等學術領域；瑪莎·蘭普蘭德 (Martha Lampland) 對匈牙利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科學發展的研究極具深度，通過她的研究，我對科學史有了進一步了解。長期以來，這三人對我的意義絕不限於學術上的導師和激勵者。韓嵩、柯素芝 (Suzanne Cahill)、盧葦菁 (Lu Weijing)、施珊珊 (Sarah Schneewind) 幫我補了中國古代史的課，他們鼓勵我超越近現代的界限思考中國問題。迪克·麥德森 (Dick Madsen) 既是我學業上的領路人，又是我的朋友。他助我思考道德和精神上的因素如何與政治交織在一起。最後要感謝的是賀肅 (Gail Hershatler)。任教於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的她是我論文的校外評審委員，給我不倦的指導，她在女性研究方面的知識和敏銳見解給我帶來靈感。

我在攻讀博士學位以及開展此項研究期間得到了一系列的資助。感謝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中國歷史研究獎學金、加州大學的環太平洋獎 (Pacific Rim Award)、富布賴特研究所的國際教育獎學金、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的國際學位論文研究金、奧克拉荷馬大學的兩項青年教師研究獎學金 (University of Oklahoma Junior Faculty Research Fellowships)。我亦曾得到奧克拉荷馬大學主管科研工作的副校長辦公室提供的資助。感謝以上機構。

如果沒有與復旦大學的合作關係以及我的中方導師、醫學史及科技史學者高晞的幫助，我不可能完成在中國的工作。高教授不僅讓我住在她家，還與我分享了她的專業知識和人脈關係，在好客和如何指導學生方面，她都是我的榜樣。我對她的幫助感激不盡。我還應該感謝眾多的機構管理人員、圖書館館員、檔案館館員，博物館、紀念館的工作人員，他們向我提供了諸多幫助，使此項研究得以繼續開展。要特別感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青浦區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江蘇省檔案館、餘江縣檔案館、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上海圖書館及其在異地的書庫 (off-site book depository)、復旦大學圖書館、上海傳染病研究所、青浦區衛生局、青浦任屯血防陳列館、餘江送瘟神紀念館，這些機構都曾向我這樣一名外國研究者提供幫助，哪怕有時候我向他們提出棘手的要求。還應該感謝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圖書館以及中國研究中心，他們也曾給我幫助。

我在諾曼城奧克拉荷馬大學服務的歷史系和國際與地區研究系，以不同的方式給我極大的支持。歷史系的女性教職員工為我提供了政治上和學術上的建議；研究東亞史的加雷特·奧爾伯丁 (Garret Olberding) 和埃利薩·費爾森 (Elyssa Faison) 是我最親密的同事，兩位都給了我特別的幫助和鼓勵。我亦應該向幾位系主任給予的指導和信任表示感謝，他們是馬克·弗雷澤 (Mark Frazier)、羅布·格里斯沃爾德 (Rob Griswold)、傑米·哈特 (Jamie Hart)、米切爾·史密斯 (Mitchell Smith)。

加州大學出版社為此書英文版做了出色的工作。在書稿的寫作過程中，里德·馬爾科姆 (Reed Malcolm) 指引我渡過了寫作過程中的道道難關。我的匿名評審人提出了許多睿智和有益的建議。安·伯吉斯 (Ann Burgess) 以科學家的身份為全書相關內容把關。最後，當本書還是一份寫作大綱時，喬治敦大學的卡羅爾·貝內迪克特 (Carol Benedict) 即已開始閱讀，直至書稿最後完成，在本書觀點形成的過程中，她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當然，書中的錯誤當由我本人負責。

如果沒有親人們的幫助，本書也不可能完成。這項研究尚在進行時，我的父親傑羅爾德·格羅斯 (Jerrold Gross) 為其每步進展而興奮，但書出版時他已去世。少年時代，我 (同父異母) 的中國姐姐向我講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一個又一個瘋狂的故事，我對中國的著迷就由此而來。我的哥哥史蒂夫、嫂子科迪莉婭、侄子塞繆爾都支援我，在技術問題上給我幫助，塞繆爾幫我做了文稿最後一遍校讀工作。最後，這項研究進行期間，母親一直是我的支柱，她曾閱讀本書多個版本的草稿，不斷鼓勵我，並對書稿的科學性及邏輯性做出評議。保持學術誠信，在以堅韌且喜悅的態度探索新知的過程中始終把人放在第一位，母親在這方面是我的榜樣。沒有家人毫無保留的鼓勵，就不會有這本書。